

龜茲劉平國刻石的發現與近代新疆

朱 玉 麒

Discovery of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n Kuča and Modern Xinjiang

ZHU Yuqi

The pap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loc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of Kuča date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makes new researches from two respects on it. First, according to the recently-discovered inscriptive writings and related inspection records i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s, the paper reviews the inscription's discovery and preserv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confirms that it was firstly discovered by Shi Buhua in the 5th year of Guangxu era (1879). Second, considering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modern Xinjiang,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discovery of the Liu Pingguo inscription is related with Zuo Zongtang's strategy for retaking the occupied region of Yili by Russia. In fact, the inscription was an unexpected finding when Zhang Yao, Zuo Zongtang's man, led his troops to make a breakthrough advancing from Baicheng area to Yili.

引言

劉平國刻石是晚清在今新疆拜城縣境內發現的最重要的漢代摩崖。它與清代前期和中期發現於哈密地區的東漢裴岑碑、沙南侯碑以及唐代的姜行本紀功碑相呼應¹⁾，在以北碑南帖爭高下、以金石證史為風氣的清代學術界引起很大的轟動。它甚至還引起了那一時期來新疆探險、考察的外國人的興趣，捆載而去的行篋中，多多少少總有這一摩崖的拓片²⁾。

劉平國刻石位於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拜城縣黑英山鄉喀拉塔格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溝溝口，是克孜爾河支流博孜克日格河的出山口。博孜克日格是維吾爾語的音譯，有“修飾、建築”之意，它與吐魯番著名的千佛洞所在地“柏孜克里克”是同一維吾爾語詞匯音譯的不同漢字書寫。劉平國刻石的地理座標是東經82°30'05"，北緯42°19'00"，海拔1900米。距拜城縣城132公里、庫車縣城175公里、克孜爾石窟120公里。從克孜爾大橋西側的入口北去，則是86公里。

從這裡入溝北上，翻越海拔3800米的阿克布拉克達坂，就抵達流入特克斯河的科克蘇河峽谷，進入伊犁河流域。這條道路過去是南北疆之間的捷徑，也一直是黑英山牧民前往北部山區夏季牧場的必經之路，今天更是徒步旅遊者挑戰的高難度道路。

劉平國刻石在今天中國傳統文化畸形發展的情形下，也受到相當的關注。如具有書法意義和收藏價值的刻石舊拓片，在拍賣會上成交的價格不斷飆升。我們從網絡上看到：晚清徐桂叢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拓片，於2008年12月23日在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2008秋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上，以35,840元成交³⁾。兩年以後，同伴作品在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北京保利2010年6月2日拍賣會·古籍文獻 名家翰墨”中以39,200元成交⁴⁾。2013年7月12日，在杭州的西泠印社拍賣有限公司“2013年春季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上，一件標示為“羅振玉舊藏《漢龜茲將軍劉平國治路頌》”的拓片，又拍出了43,700元的高價⁵⁾。最新的消息是：上海朵雲軒拍賣有限公司又將於2013年12月24日的“2013秋季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中，拍賣一份經鄭文焯、鄒安、鄭叔問、唐希陶等名家舊藏並題跋鈐印的《漢劉平國刻石》拓本，估價25,000至45,000元⁶⁾。

對於日本的學者來說，值得關注的是，日本的書法家牛丸好一曾經寫過《中國隸書摩崖之旅》

1) 漢唐西域碑刻在清代的發現，參筆者《漢唐西域紀功碑考述》，《文史》2005年第4輯，125-148頁。

2) 《劉平國刻石與外國探險家》將是筆者另文揭示的內容。

3) <http://pm.findart.com.cn/753381-pm.html>。

4)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33233-166163028.shtml>。

5)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99904-499518386.shtml>。

6)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105377-526881230.shtml>。

的文章，介紹其在2000年尋找中國的隸書摩崖而來到最西部的劉平國刻石處的情況⁷⁾。

此外，在拜城縣這個以富裕命名、卻很少出現名人的地方，劉平國作為拜城的形象代言人，而于1999年被雕塑為一個將軍的形象，豎立在城市中心的世紀廣場上。

但是，實際存在的劉平國刻石本身，其被保護的狀態卻令人擔憂。1957年，這一摩崖就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政府列為第一批自治區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古跡。雖然近年拜城縣文化體育廣播影視局（簡稱“文體局”）也派有當地看護員做一個月一次的巡迴管理，但是由於荒遠偏僻，人為和天然的破壞仍然不斷持續。筆者曾于2008年1月前往考察，周圍石壁的塗畫不在少數，而2002年特大洪水留下的水位線仍然可以看到對於距離地面約1.8米的兩處石刻的破壞。2012年拜城縣文體局雖然公佈了投資80萬元的“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治關城誦石刻遺址防洪壩工程”通過驗收的消息⁸⁾，但新建的這個文字錯誤甚多的劉平國將軍紀念碑和148米的防洪堤壩究竟能夠應對多少不可知的破壞，仍然是個疑問。這也是筆者認為這是中國當代文化畸形發展的個案：當刻石的拓片被哄擡、哄搶之際，原石的命運卻岌岌可危。“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這篇對於劉平國刻石的研究文章如果能夠起到引起社會各方對石刻保護的重視，那是筆者深感榮幸的事。

有關劉平國刻石在清代發現、拓本流傳、史事考證的情況，馬雍先生在1980年代曾經發表過系統研究的文章⁹⁾。最近，陶喻之先生也在撰寫《〈劉平國刻石〉匯考》的文章，相信對於晚清以來前輩學人的研究成果有更為詳細的記載¹⁰⁾。本文則就該刻石的發現、保護，根據新的材料進行探究，並將其與近代新疆的關係作出一個歷史學的研究。

一、劉平國刻石的發現與保護

劉平國刻石由於地處偏僻，早期從事研究的學者，幾乎沒有一人親歷其地。因此關於它在晚清的發現時間和地點、形制等等客觀事實，沒有多久就傳聞失實。就本文研究相關的發現時間而言，就有咸豐、同治年間（1851-1874），光緒二年（1876）、三年、四年、五年、六年等等不同的說法。

7) 牛丸好一《中國隸書摩崖之旅》，原載日本《墨》2004年9-10期（總70期）；潘力中譯本載《中國書法》2005年1期，18-23頁。

8) 參拜城縣政府網站：<http://www.xjbc.gov.cn/Item.aspx?id=5092>。

9) 馬雍《〈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集釋考訂》，原載《文物集刊》第2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收入作者著《西域史地文物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24-40頁。

10) 陶喻之《〈劉平國刻石〉匯考》的初稿係參加“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0月19-20日，新疆師範大學，烏魯木齊）論文，參《“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89-321頁。修訂稿將在2014年由科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論文集《西域考古·史地·語言研究新視野：“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發表。

咸豐、同治年間的說法，出自張度（1830-1895），其言“咸、同間此石始著”¹¹⁾。這與我們後面即將分析到的近代新疆形勢是有很大出入的。

光緒二年說最早見於光緒九年趙於密（1845-？）的題跋，其後王仁俊、田北湖、吳湖帆等均襲用之¹²⁾。

光緒三年說最早見於宣統三年王樹枏（1851-1936）等纂修的《新疆圖志》記載¹³⁾，其後為王樹枏《新疆訪古錄》沿用，影響了黃文弼（1893-1966）乃至今天新疆文物系統的記錄。

光緒四年說則見於吳昌碩（1844-1927）的所謂“光緒戊寅”的題跋¹⁴⁾。

光緒五年說由施補華（1836-1890）在其光緒八年的《劉平國碑跋》中提到，並在後來他為內地文人收藏的拓片題跋上多處提及¹⁵⁾。

光緒六年說則出自柯昌泗（1899-1952）的《〈語石〉異同評》¹⁶⁾。

為此，馬雍先生的文章專門作出了辨析，而以施補華發現於光緒五年為正確的說法。

光緒五年發現劉平國刻石是與我們後面討論近代新疆的戰爭形勢相吻合的，也是我們下文歷史學討論的重要依據，因此本文的這一部分，將再次通過劉平國刻石被保護的相關記載，證成施補華光緒五年說的正確性。

為了討論的方便，先將施補華的題跋中論及發現經過及與以下論證相關的文字逐錄如下：

此碑在今阿克蘇所屬賽里木東北二百里山上。[光緒]五年夏，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疑為漢刻。秋八月，余請于節帥（師）張公，命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具氈椎，裹糧往拓之，得點劃完具者九十餘字。按，文稱“永壽四年（158）八月”，永壽為後漢桓帝年號，《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建和、和平、永興、永壽、延熹、永康，其稱永壽凡三年，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後漢都雒陽，視長安較遠。其時當未奉改元之詔，故稱永壽四年耳。……按，溫宿，今阿克蘇；姑墨，今賽里木、拜城；龜茲，今庫車。……光緒八年十月¹⁷⁾。

施補華（1835-1890），字均甫，浙江烏程（今屬湖州）人，同治九年（1870）舉人，先後入

11) 張度題跋原文未見，引自馬雍《〈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集釋考訂》，《西域史地文物叢考》，26頁。

12) 陶喻之《〈劉平國刻石〉匯考》，《“黃文弼與中瑞西北科學考查團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90頁。

13) 王樹枏等《新疆圖志》卷八七《古跡志》“拜城縣·漢烏壘關”條，北京：東方學會，1923年本，7A。

14) 馬雍《〈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集釋考訂》，《西域史地文物叢考》，26頁。

15) 馬雍《〈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集釋考訂》，《西域史地文物叢考》，24-25頁。

16)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二，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98頁。

17) 施補華《劉平國碑跋》，《澤雅堂文集》卷七，光緒十九年刻本，1A-2A。

佐左宗棠、張曜幕府，在光緒五年至十年期間，進疆參與了平定阿古柏叛亂之後幫辦軍務的善後事宜。其後以道員改發山東，未就任而卒。有《澤雅堂文集》、《澤雅堂詩集》、《峴傭說詩》傳世，事蹟見楊峴《山東候補道施君墓誌銘》。施補華的題跋，還見於他回到內地後在分贈給盛昱、王懿榮等學者的拓片上。如近期刊佈的上海圖書館保存的王懿榮舊藏《劉平國刻石》拓片上，就有施補華光緒十五年的另一則題跋：

余於光緒五年，得此鳩茲山中。八年，為之跋。九年，命工拓數十紙，分貽海內朋好。伯羲祭酒、廉生太史皆裝為大卷，屬題其後。按，此刻文字，余於跋尾既略為考證，祭酒後補其未及若干字，審定為《劉平國斲孔記》，釋其義於右方矣。唯此刻既顯，拓者踵至，咸以軍人充其役，手與紙墨夙不相習，椎斲又復未具，往往點畫不可辨識，甚者脫去“京兆淳于”數行。而種人居山下者又患其擾累，謀劃去之。予為就崖窟作亭，覆蓋其字。召酋長受約束，毋俾其壞。於今六年，損壞與否，實不可知。然料他人之所拓，與拓之異日者，其不能如此本決矣。對此本，如在疏勒軍中萬里憶朋好也。廉生仁兄屬正。除日弟補華¹⁸。

從以上兩則題跋的相關記載可以瞭解到：光緒五年的夏天，赴南疆平定阿古柏（1820-1877）叛亂的張曜（1832-1891，字亮臣，號朗齋，諡勤果）所率領的嵩武軍軍士在博孜克日格山口偶然發現了摩崖上的劉平國刻石文字，回來向幕府中的施補華談起。施補華因此專門向張曜請示，而派了總兵王得魁、知縣張廷楫率領兵士於當年八月前往椎拓。經過對拓片的仔細研究，施補華證實這是一份重要的漢碑。三年之後，他寫定了研究的文字，即此《澤雅堂文集》卷七中的《劉平國碑跋》。

但是施補華的這一發現也帶來了巨大的麻煩：在崇尚古刻的清代，這個出現在遙遠地方、遙遠年代裡的漢字石刻，肯定帶來了當時文人無窮的興趣，要求椎拓的人蜂擁而至。今天中國國家圖書館保存有光緒十一年塔爾巴哈臺參贊大臣錫綸（1843-1888，字子猷，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藍旗人）題跋的舊拓片，錫綸的題跋幾乎完全照抄了施補華的考訂文字¹⁹，可見是受到了施補華宣

18) 馬雍《〈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作亭誦〉集釋考訂》，《西域史地文物叢考》，25頁。馬雍引文係由新疆博物館藏周大烈舊藏過錄本轉抄。施補華題王懿榮舊藏拓本則由仲威年初發表，參仲威《關於龜茲左將軍劉平國摩崖王懿榮藏本》，《東方早報》2013年1月7日B10版；又《漢碑善拓過眼之三》，《書法》2013年第2期，90-95頁（劉平國碑拓片介紹在92-95頁）。

19) 錫綸的這一舊藏拓片及題跋，有《北京圖書館藏歷代石刻拓本彙編》黑白影印本，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冊，112頁；《西域遺珍——新疆歷史文獻暨古籍保護成果展》彩色影印本，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18-21頁。按，施補華的題跋在《澤雅堂文集》本中言“《後漢書·桓帝紀》凡年號六”，實當作“七”，奪“元嘉”年號。錫綸的題跋轉述時糾正之，可見施補華在抄錄給友人的題跋過程中也不斷作出

傳的影響；而錫綸的文字，又被轉抄在遠藏于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舊拓本上²⁰⁾。由此輾轉的流傳，即可知當時在新疆官場這一拓片的需求之廣。從施補華的題跋中可以瞭解到，被派往這一僻遠之地的軍士和當地的維吾爾族居民對拓碑的差使均不堪其擾，後者甚至謀劃破壞這一石刻來永絕人望。

施補華在得知這一情形之後，再次動用了官方力量，“就崖窠作亭，覆蓋其字”，並“召酋長受約束，毋俾其壞”，即修建保護性建築、責成當地居民的頭領承擔起看管石刻的任務。作亭覆字而令民約束，似乎可以看作是新疆官方在沒有文物保護法的年代裡最早採取的文物保護措施。不過這一措施後來的實施情況如何，施補華在光緒十五年題跋的時候說到：“於今六年，損壞與否，實不可知。”他本人並不瞭解這一由他提議的保護工作的進展情況。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相隔二三十年後，日本的探險家來到此間，卻目擊了這一保護現狀。這便是晚清光緒、宣統年間，即日本的明治後期大谷光瑞（1876-1948）探險隊的三次考察，其中第一次考察隊員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第二次考察隊員野村榮三郎，以及第三次考察隊員吉川小一郎在1903、1909、1913年的日記中，記錄了劉平國刻石當時的狀況。茲分別摘引如下：

渡邊哲信《西域旅行日記》

(1903年) 四月十三日 星期一 續往明布拉克 八炮臺弱

午前八時二十分出發，正午到達石碑所在地，離開當地、踏上歸途的時刻是二時四十五分，五時十五分到阿爾斯蘭村長【百人長】的家。路線是往北走，東邊有條河。據說這條河流入赫色爾河。此處石磧恰如河洲一般，高出田圃表面三間許。又出現一道南流河水，於是沿著東岸前行。東北方……阿爾通伙什山西邊一座山峰稱為博子克勒克，兩峰高度相當，後者帶有石灰巖形成的赭色。流出兩峰峽間的河流名為博子克勒克河。此河右岸有一小屋，占地一間與一間半許見方。此屋即以博子克勒克山崖為後壁，崖壁刻字處便是烏壘碑。聽說為保護碑文，距今八年以前，バイ・バン・シユ【或即朱？】出手令人建此屋。又此碑乃距今二十五年前，因一土人【已故】而得以發現云云。

之前说过那位工于拓碑的土民千人长〔Min bashi〕到来。他先在紙【強度介於唐紙與白紙之間的紙】上噴水濡濕，貼在凹凸不平的巖面，隔氈片用木槌敲打許久。待紙緊密貼著石刻，用水溶解墨粉，作成濃汁，用好像是棉花包著的圓頭工具塗蘸，輕輕在紙面上敲打之後刷過。碑文刻在大小兩塊地方，小處字少，大處字多。余試用日本石折墨刷之，但因巖面

修訂，反而是留在篋中的底稿身後刻入文集時無從修改。

20)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碑帖》彩色影印本，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1頁。

凹凸而失敗。

堀賢雄《堀賢雄西域旅行日記》

(1903) 四月十三日 Monday Arslan 6850

Dp. 8.20 a.m. ar. 5.15

碑所に滞在2.45 Time 6.10, 8P.

七時起床，早飯照舊。[吾等]率巧于拓石之村民及昨日三人（Momin、百人長與通事）出發參觀石碑，另一村之百人長及二三騎（為入與夕景同照）亦跟上來。

出發後向北、西北前行，進入田疇，約1½位炮臺處道路碎礫極多，抵達荒原地帶。續沿同一方向前進，來到生有棕色荊棘、像是散佈無數海膽的雜草原，過此復行約2炮臺，即接近河谷，見到前方山陵屹立靄中。人說山陵南側有石碑。其山薄靄環繞，遠見不辨其巖質。

12.00至石碑處。人云碑在溪流山腳數千呎壁立巖石之麓，築有小屋，而碑便在屋內。入內未見碑石之物，便問隨來村民，答說“那裡、那裡！”（Mana Mana!）並指著那片石壁與地面相接之處。熟視方見到巖面一側削平，刻有數十字，大小二塊均刻在巖面上，不能稱之碑石，先即大為失望。……似此這般，今日之行殆屬徒勞。見碑以前，歡喜振奮，還說要將拓本裱成卷軸，現要裱成卷軸也是白花裝潢費用而已。

令村民拓此大小碑石（?），得大碑四[拓]、小碑三[拓]。此間共停約二小時四十五分，攝下全景，用過煮蛋與茶，便踏上歸途。

野村榮三郎《蒙古新疆旅行日記》

(1909年) 四月二十八日 晴 明不拉發 抵烏壘碑

晨六時出發向北。接抵天山山脈腳下的是巖石形成的峽門。烏壘碑乃在明布拉北方五十清里，直接刻在宛如山門關口的石崖上，距路面高約二尺餘處。現在縣衙方面令人築屋保護。一到此碑，便即著手拓印，刷完八份時已屆正午。

吉川小一郎《支那紀行》

(1913年) 五月廿七日 星期三 北風強，陰天 6:05起 57°F

因想一見[明不拉克]臺地北方山谷中的劉平國碑，我讓土人嚮導，一共五騎出發。在昨日涉水處的上游渡河。土人引用此水，耕種磧地，但只能栽培烏麥。石碑就雕在峨峨巖壁

上，前面建有茅屋保護。花費兩小時做了十數份拓本，於是踏上歸途²¹⁾。

從渡邊哲信和堀賢雄以上所引日記之前的記載中，可知是他們在訪問拜城知縣鄭有敘的過程中，得知了劉平國刻石的消息，因此在鄭的協助下，前往考察了刻石原地；後來的野村榮三郎、吉川小一郎也都是在拜城縣衙門的支持下訪問了這一地方。他們都共同記載了保護在崖壁前的小屋。渡邊哲信甚至聽說了“為保護碑文，距今八年以前，バイバン シュ出手令人建此屋。又此碑乃距今二十五年前因一土人而得以發現”的消息。按照這個聽聞推算，建屋的時間是在1896年即光緒二十二年，發現的時間則在1879年即光緒五年。關於建屋的時間，與施補華所說的光緒九年相差較大，可能是後來重修的時間；又或者這種沒有文字記載的口述歷史當然有其記憶不能完全準確的地方。

渡邊日記中提到的“バイバン シュ”是對當地人發音的記錄，バイバン可能是“幫辦”不標準發音的記錄，而シュ，渡邊懷疑是“朱”字，但它也同樣可以是“徐”字並不標準的發音記錄。這一點，讓我們聯想到柯昌泗《〈語石〉異同評》中的記載：

光緒庚辰（六年），固始張勤果公曜駐兵阿克蘇、喀什噶爾，始訪得漢劉平國造烏累關城摩崖，令總兵王得魁攜紙墨往拓之，即此石初拓本也。石在今拜城縣東北二百餘里，曰希拉可莊，傳為漢西域都護建牙之地，即烏壘關城。又東北五十里，曰博子克勒克山，入山五里，即摩崖也。距地六尺。下方京兆長安淳于伯隱作此誦，三行十一字，距地僅尺許。長沙徐叔鴻尚書（樹鈞）之弟桂叢刺史，在勤果幕，得碑其所目擊。後權知拜城縣事，乃疊石為屋以護之。曾見尚書題此拓本，記所言如此。勤果傳拓此石，與裴岑紀功碑之傳自岳襄勤者，先後為西征名將佳話²²⁾。

在這一題跋中，柯昌泗提到了為劉平國刻石“疊石為屋”的，是曾經在張曜幕府幫辦軍務、後曾代理拜城知縣的徐桂叢。徐桂叢名不顯，但是他的堂兄徐樹鈞（1842-1910，字衡士，號叔鴻）卻是晚清著名的金石學家，以得王獻之《鴨頭丸帖》真跡而名其室曰寶鴨齋。有《寶鴨齋題跋》等傳世，其中收錄的題跋中有《龜茲劉平國碑並釋文》一則，提及：“余弟桂叢從軍西域，得此二

21) 以上所引渡邊哲信、野村榮三郎、吉川小一郎日記，出自上原芳太郎編《新西域記》，東京：有光社，1937年。堀賢雄日記見西域文化研究會編《西域文化研究（四）》，中央アジア仏教美術，京都：法藏館，1961年。承慶昭蓉、萩原裕敏二位博士譯成中文，謹此致謝。《新西域記》的中文翻譯係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清代新疆稀見史料調查與研究”（項目編號：11&ZD095）子課題“清代新疆與海外檔案史料”成果之一。

22)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語石·語石異同評》卷二，98頁。

本，屬余釋其文，以一本歸之。”²³ 其中沒有記載柯昌泗提及的徐桂叢築屋保護事蹟，疑柯氏所見為徐樹鈞的另一拓本題跋。

不過，我們還可以看到柯昌泗的堂兄柯莘農（1883-1945，原名士衡，字莘農其字，號逸園）也珍藏有徐桂叢的一件舊拓，即上文“引言”提及的那件連續在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2008秋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和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的“北京保利2010年6月2日拍賣會·古籍文獻 名家翰墨”中出現的《漢龜茲左將軍劉平國碑》拓片。在這一拓片的左下角，鈐有“姑墨令章”白方印、“徐桂叢手拓本”朱方印二枚，無疑都證明了這是徐桂叢擔任拜城知縣時所拓舊本²⁴。

從以上各種拓片的題跋和印記綜合而言，我推測光緒九年施補華的所謂“予為就崖窠作亭，覆蓋其字。召酋長受約束，毋俾其壞”實際上只是一種建議，他是對於劉平國刻石進行保護的一個提倡者。從他在張曜軍中最後“以功復原官翎枝，擢知府，加鹽運使銜”來看²⁵，他的地位和職銜都很高，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那仍然是沒有任何實職的幕僚。因此劉平國刻石的保護措施，只能委託給由幕僚而代理了拜城知縣、掌有地方實際權力的徐桂叢來完成。“徐幫辦”因此而由當地維吾爾族傳訛為渡邊哲信記錄中的“バイバン シュ”。從劉平國刻石在日本探險者遊記中所見築屋保護並派專人比較得法地拓碑來看，徐桂叢認真執行了這一保護方案。“徐桂叢手拓本”的印章以及他被當地民眾記為“バイバン シュ”，也使我們相信他可能是真正親臨其地的第一個文人。這件手拓本的文字特點，與馬雍先生描述的拓本分期來看，是比最早的第一期（光緒五年前後）清晰拓本少了八九個字的第二期拓本，因此，他與劉平國刻石因捶拓過度而需要保護的時段（光緒九年前後）是相吻合的。

距離吉川小一郎訪問刻石地十五年之後，黃文弼先生作為一個現代考古學家於1928年來到了劉平國刻石地。雖然這些保護摩崖的房屋已經蕩然無存，但是他仍然見到了曾經為官府看護石碑的當地維吾爾族居民，為我們確信清末曾經有意識保護劉平國刻石的措施再度做了印證。據《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的記載：

（1928年11月25日）12點20分，渡博者克拉格河，沿河向北偏西20°行，至榆切大板村莊。

23) 徐樹鈞《寶鴨齋題跋》，1929年石印本，上7B-8B。

24) 清人以漢代姑墨國當今拜城縣境，見上引施補華《劉平國碑跋》。徐桂叢在新疆的經歷還影響到了其子徐崇立（1872-1951，字健石，號瓚園）對西北邊疆的關注，後者根據魏誠《喀什噶爾與墨克道里記》、《新疆勘界公牘匯鈔》和袁大化《辛亥撫新紀程》編成的《西域輿地三種匯刻》，當時流傳甚廣。

25) 楊峴《山東候補道施君墓誌銘》，繆荃孫輯《續碑傳集》卷三九，武漢：江楚編譯書局刊校本，宣統庚戌（1910年），4B。

1點10分，住於一維民家中。此維民大拐提馬木，曾看守石碑者，後因有人告發，遂罷。據說此石碑尚在溝內約30里，今日去不能回，擬明日前往查看²⁶⁾。

以上的日記，在後來的正式考古報告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記錄：

(1928年11月25日)午一時，至榆切大板，住一維民大拐提馬木家。渠曾看守石碑數十年，據說此碑在溝內刻於一巖石上。次日攜帶拓字器具，由住處前往。向北行，渡博者克拉格河，入戈壁，小山阜起伏不絕，約二十里抵博者克拉格溝口。刻石即在溝西一巖石上。刻字處距地面尺許，隨巖石之隆窪曲折鑿刻²⁷⁾。

黃文弼先生關於石刻的記載沒有提到任何在石壁上築屋的事，從最早單獨發表的《拜城博者克拉格溝摩崖》所附實拓照片來看²⁸⁾，也確實沒有築屋的痕跡。可見看守員因人告發而罷免後，便沒有了保護。但是維民大拐提馬木以往曾經看守石碑數十年的事實，還是被他記錄下來了。

在有關劉平國刻石發現的問題上，光緒三年徐萬福發現說至今仍在一些重要的場合被接受。原因是這一觀點是由王樹相作為新疆布政使而主持纂修的《新疆圖志》以及親自編撰《新疆訪古錄》中提出，其任職新疆的經歷就有了某種權威意義。但是相比于施補華光緒初年在庫車、拜城地區更加貼近遺址本身而言，雖然同樣是在新疆，仍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在劉平國刻石發現三十年後纂修《新疆圖志》的烏魯木齊官員們的記載，還是難免道聽塗說的失誤。

因此，以上種種關於劉平國刻石保護的記載，不僅為我們提供了清代地方官府對於文物古跡的重視態度，同時也使我們確信了施補華發現劉平國刻石記載的真實性。

二、劉平國刻石的發現與近代新疆

光緒五年劉平國刻石的發現，雖然由施補華對拓片的最早考證而大行於世；但確切地說，是因為“有軍人過其地，見石壁露殘字，漫漶不可識，或以告余”（前引施補華跋語），才為施補華所留意。因此，劉平國刻石真正的發現者，是一個（或者幾個）沒有留下名字的普通軍人。

軍人何以會來到偏遠的天山山腳下目擊這一摩崖？這便是本文需要論述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劉平國刻石的發現與近代新疆的戰爭形勢密切關聯。

晚清新疆最重要的一個事件就是同治三年波及全疆的民變，這一推翻官府的變亂恰恰就是從

26) 黃文弼著，黃烈整理《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336頁。

27) 黃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年，34頁。

28) 黃文弼《拜城博者克拉格溝摩崖》，《女師大學術季刊》1卷4期（1930年），1、2頁。

我們討論的古龜茲地區開始發生的。它造成政局的動盪，使清政府行之有效的伊犁軍府管理體制全部癱瘓。中亞浩罕軍官阿古柏乘機入侵南疆，並進逼烏魯木齊，帶來了長達十多年的割據、動亂。清政府收復新疆的局面直到光緒元年改任左宗棠（1812-1885）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之後，才略有起色。按照左宗棠“先剿北路而後加兵南路”的戰略，北疆略定之後，劉錦棠、張曜、徐占彪的三路軍隊於光緒三年三月分兵南下，于年底平定南疆八城²⁹⁾。

然而平叛結束了的善後事宜卻一樣非常複雜，從俄羅斯手中收復伊犁即是其中的關鍵。

在全疆動亂之際的同治十年前後，俄羅斯以“代收代守”的名義，出兵侵佔了伊犁，並以清政府恢復新疆的控制權（“新疆之復”）為歸還之期。因此在光緒四年初新疆平定後，左宗棠與伊犁將軍金順即奉旨派員與俄官議還伊犁事。在俄方以各種理由拖延的情況下，清政府於光緒四年六月派出崇厚（1826-1893）出使俄國，辦理伊犁交涉事宜。五年八月，崇厚“未候朝旨”而擅自簽訂《交收伊犁條約》（即《里瓦幾亞條約》），其中於國家利益多所喪失，引起朝野大嘩。關於伊犁領土的條約內容，是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及伊犁河上游的特克斯河流域歸屬俄羅斯，不僅丟失原來領地，也使南北疆的兩處通道——木紮爾特達坂和貢古魯克達坂劃在界外，造成伊犁孤懸、南北疆隔絕。對於這樣一種喪權辱國的越權訂約行為，自不能為中國所接受，因此，光緒六年正月，清政府派出欽差大臣曾紀澤（1839-1890）出使俄國重訂和約。

就中國立場而論，可以不承認這一未經皇帝表決的擅權約定；而對於俄羅斯而言，放棄原定協議中的分外收穫而改弦更張，自然不會善罷甘休。從黑龍江到喀什噶爾的漫長邊界線上，俄羅斯頻繁徵兵壓境，並揚言要兵船封鎖遼東海域。曾紀澤能否成功再議，對於1840年以來在外交史上不斷簽署不平等條約的中國而言，光緒朝廷並無勝算，因此在當年閏二月曾紀澤出發後，特旨下達給左宗棠：

現改派曾紀澤前往再議，惟彼國不遂所欲，恐伺隙啟釁，必須有備無患，以折狡謀。左宗棠熟悉邊情，老於軍事，著將南北兩路邊防通盤籌畫³⁰⁾。

左宗棠也迅速提出了武力收復伊犁的戰略：

現擬規復伊犁，東路宜嚴兵精河一帶，扼其紛竄，伊犁將軍金順主之。中路由阿克蘇冰嶺之東，沿特克斯河徑趨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貨往來之道，廣東陸路提督張曜主

29) 平定阿古柏叛亂前後的史實，可參劉錦棠《劉襄勤公奏稿》、魏光燾《勘定新疆記》及王樹相等纂《新疆圖志》卷一一六《兵事》二等。

30) 《新疆圖志》卷五《國界》一，28A。

之。西路取道烏什，由冰嶺之西經布魯特遊牧地，約七站抵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此路久經封禁，道光初，那彥成、德音阿指為換防官兵往來快捷方式者也，通政使司劉錦棠主之³¹⁾。

面對中國軍隊在西域的嚴陣以待這一重要的因素，俄羅斯最終選擇了與曾紀澤再度和議。光緒七年正月二十六日，雙方在聖彼得堡簽署了《中俄伊犁條約》（又稱《改訂條約》或《聖彼得堡條約》），其中特克斯河谷的收回，是界務方面難得的勝利。

以上關於收復伊犁事件的冗長回顧，與本文關係密切的是：左宗棠所以能夠立即製定出武力收復伊犁的決策，一定是在他平定阿古柏叛亂、收復南北疆以前就開始籌畫了的戰略。

中國與俄羅斯的國際關係，從康熙以來逐漸頻繁；認識到俄羅斯在東方的擴張野心，必定是籌畫西北邊疆問題的常識。左宗棠督辦新疆軍務而通盤考慮收復方案，接收被俄羅斯佔領的伊犁當然是重要的棋子。《新疆圖志·交涉志》記載：

光緒元年三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進駐肅州。案，查是年六月，俄遊歷官索思諾福詣行營見宗棠，言俄皇立意與中國永敦和好，故令其前來，從前回逆馬海乞降納款，俄皇斥其為賊，拒之境外，原俟回疆漸定，即將伊犁交還。時陝回白彥虎踞古牧地、瑪納斯等處，回夷勾結，互相援系，於是宗棠定先剿北路而後加兵南路之策³²⁾。

從左宗棠的策略可以看出，他對於北路俄羅斯與白彥虎可能形成的戰略同盟非常警惕，因此制定了剿滅北路叛亂、孤立俄羅斯，然後再平定南路的計畫，可見俄羅斯在伊犁的佔領一開始便成為左宗棠特別考慮的因素。

收復伊犁需要動用武力的考慮，在曾紀澤出使之前就已經為左宗棠所籌畫就緒。光緒五年崇厚簽約之後，左宗棠即奉上諭：“崇厚奉使俄國，……乃竟任其要求，輕率定議，殊不可解。……左宗棠于新疆情形瞭若指掌，金順、錫綸久在西北，諳習邊情，著一併核議，密速具奏。”³³⁾此時的左宗棠便具疏極論，略曰：“俄與中國陸地相連，僅天山北路為之間隔。……此後蠶食不已，新疆全境將有日蹙百里之勢，秦隴燕晉邊防因之益急，彼時徐議籌邊，正恐勞費不可殫言，大局已難覆按也……就事勢次第而言，先之以議論，委婉而用機，決之以戰陳，堅忍而求勝。臣雖衰駑

31) 《新疆圖志》卷五《國界》一，28A。

32) 《新疆圖志》卷五四《交涉》二，3A-3B。

33) 《新疆圖志》卷五四《交涉》二，6A-6B。

無似，敢不勉旃。”³⁴⁾左宗棠“決之以戰陳，堅忍而求勝”所表達的決戰信念，至少在光緒五年就已經胸有成竹了。

在確定曾紀澤出使時，左宗棠也具奏說：“曾使前往再議，詞嚴義正，自可折其機謀。若得成議而返，庶幾息事安邊，事有結果。儻其始終堅執，辯論竭而釁端開，非合南北全力慎以圖之不可。請督師出屯哈密，規復伊犁。”³⁵⁾因此曾紀澤到達聖彼得堡之後，在與俄羅斯官員的談判中也曾經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中國百姓未必不願與鄂（俄）國一戰。中國人堅忍耐勞，縱使一戰未必取勝，然中國地方最大，雖十數年亦能支持。”³⁶⁾這一表達，無疑有左宗棠的影響存在。所以《新疆圖志·交涉志》評論說：“於是宗棠分兵四路，進規伊犁，昇輜馳抵哈密。俄人偵知我國有備，聞我王師大出，不敢勞師遠涉，輕啟兵端，商改條約之事漸次就範。故曾使得以從容辯論，保全數百里疆索還隸職方者，宗棠之力也。”³⁷⁾

左宗棠以古稀之齡抗着棺材（昇梓）抵達哈密來指揮收復伊犁的戰事，是以一種姿態來表達誓死決戰的信心。在這種姿態背後的支撐點，是他對於武力收復伊犁做出的周密安排，即上述進軍伊犁的三路兵力部署。除了在天山北部由伊犁將軍金順率領的精河一線主力外，左宗棠安排的另外兩路兵力正是進赴南疆、平定阿古柏叛亂的以劉錦棠（1844-1894）的老湘軍和張曜的嵩武軍為核心的軍隊。他們以阿克蘇的冰嶺即木紮爾特達坂為分界，被安排為進擊伊犁的中路和西路軍。

穿行木紮爾特達坂的冰嶺道，是從南疆翻越天山進入伊犁河谷最重要的幹道，乾隆以來專門派有極鑿冰梯的“達巴齊”維護道路的暢通³⁸⁾。但是左宗棠沒有使用這條道路，可能與這一道路行走艱險、不適合於大部隊行軍有關³⁹⁾；或者兵貴奇詭，放棄這條通常的大道與俄羅斯軍隊有所設防而難於穿越有關。因此啟動冰嶺道東西的不尋常道路，成為收復伊犁的軍事機密。

冰嶺以西的捷徑，是一條早已廢棄的道路，從距離和出奇製勝的角度上來說，是非常合適的。在《新疆圖志·山脈志》據引清代各種行記而有詳細的描述，茲摘要如下，以見左宗棠選定這一道路的考慮：

貢古魯克山嵐層複，巖坂峻險。山間溪澗縱橫，谷中尤隘，凡百餘里，僅容單騎。有地曰南、北郭羅，北郭羅通伊犁之伊克哈布哈克卡倫，南郭羅則布魯特所遊牧也。《莎車行紀》

34) 《新疆圖志》卷五四《交涉》二，6B-8A。

35) 《新疆圖志》卷五四《交涉》二，9B。

36) 曾紀澤撰述《金軺載筆》卷二，袁同禮校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年，8頁。

37) 《新疆圖志》卷五四《交涉》二，10A。

38) 參徐松《西域水道記》卷二，朱玉麒整理，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1頁。

39) 劉錦棠《請按約索還烏什之貢古魯克地方折》即有“阿克蘇冰嶺臺路艱阻萬狀，夏月冰渙，四山圻溢裂流，峭壁森立，莫能飛渡”之語，轉引自《新疆圖志》卷八九《奏議》八，13B。

云：“自伊犁惠遠城起，西南十七站，由布魯特遊牧地方直抵烏什，為行兵快捷方式。道光八年（1828），奉旨著伊犁將軍、烏什辦事大臣將伊犁南路哈布哈克卡倫、烏什迤北貢古魯克卡倫添派官兵巡訪，不許夷民取道往來。”今考伊克哈布哈克卡倫越貢古魯克山以達烏什之路，懸崖峭壁，險阻異常。承平時有人行走，亂後路為賊毀，人跡罕到矣⁴⁰。

與本文相關的張曜率領的中路軍隊被部署從木紮爾特達坂以東向伊犁進發。這一道路，必然就在今天的拜城縣境內尋找。拜城縣境主要為木紮爾特河與克孜爾河東西環抱，二者在南邊的克孜爾石窟附近匯流為渭干河。其間從北部天山峽谷流出的水流都會匯入其中之一，而它們都有可能成為沿著峽谷通向伊犁河谷的道路。

於是，從時間和地點高度的吻合程度上，我們可以水到渠成地作出如下推論：

在明確了左宗棠的戰略部署之後，張曜的部隊承擔了從拜城縣境內翻越天山進攻伊犁的任務，因此他在光緒五年開始探尋一條最為便捷的道路。在當地居民的嚮導下，他的軍士走向了劉平國刻石所在的博孜克日格溝口。也許是維吾爾族嚮導告訴了軍士們他們早已看到過的摩崖刻石（如前引渡邊哲信的日記所言），也許是軍士們自己在溝口憩息之際發現了這一漢字遺跡（如施補華題跋的記載），從此劉平國刻石名揚天下。

這場收復伊犁的戰爭預案並沒有真正實施，僅憑有限的資料，我們並不清楚在左宗棠計畫中的那條冰嶺之東道路——“沿特克斯河徑趨伊犁，計程千二百五十里，本商貨往來之道”是否即穿行博孜克日格峽谷的道路，但是劉平國刻石應該是在踏勘那條進軍線路的過程中被意外發現的。

餘 論

參加平定阿古柏叛亂並擔任了新疆建省後第一任巡撫的劉錦棠曾經將從伊犁通往南疆的捷徑概括為四條⁴¹，而通過博孜克日格溝口的道路並不在其中。博孜克日格溝是如此偏僻地出現在天山南麓的一個僻靜角落，作為天山南北的一條通道，穿越它仍然是非常艱難的過程。只有非常時期的非常需要，人們才會考慮到它。東漢龜茲國的將軍劉平國在這裡刻石的原因，雖然後世的解釋分歧，但終究不離作為具有戰爭性質的邊界防禦與交通功能。

40) 《新疆圖志》卷五九《山脈》一，27B。

41) 劉錦棠《請按約索還烏什之貢古魯克地方折》：“臣查伊犁通南快捷方式有四：一自那喇特卡倫，經朱勒都斯、察罕通格兩山，以達喀喇沙爾。一由穆素爾達巴罕渡特克斯河，逾冰嶺以達阿克蘇之札木臺；一出伊克哈布哈克卡，越貢古魯克達巴罕，以達烏什；一出鄂爾果珠勒卡倫，逾善塔斯、巴爾琿兩山，渡納林河，以達喀什噶爾。”轉引自《新疆圖志》卷八九《奏議》八，13B。

而如本文開篇所言，劉平國刻石的被發現，與裴岑碑、沙南侯碑、姜行本紀功碑的發現一樣，都是因為西域的戰事導致了軍隊跋涉到不同尋常的天山深處，因而就有了西域古代歷史遺跡的重光人世。從這個意義層面上，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清代與漢、唐在西域經營的歷程，還真是有很多的相似性存在着。

